

# 过去贯通于现在 现在孕育着未来

——普希金的历史主义观初探

查晓燕

象任何领域个别而又伟大的人物一样,普希金善于对历史、对古代文化进行饱含哲理的思考。他把握历史的立足点是现在,因此,他没有沉迷在史料的海洋中津津乐道于考证,而是总能跃出历史的事象,将过去贯通于现在,用历史解决当代的问题,进而找到对未来的决断,对未来的责任。

普希金的历史主义观集中表现为三点:一、俄国的历史是以俄罗斯民族独特的文化为根基发展起来的,而不是模仿欧洲模式的产物,俄国历史与其他欧洲国家从来没有可寻的共同处,因此,评价俄国历史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尺度。二、俄罗斯人应当拥有珍视、热爱自己祖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感情。对历史的热爱就是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对统一的热爱。三、诗人是真正撰写历史的人。诗人记录并珍藏着对民族与国家的感情、思考与理想,体现并延续着民族与时代的精神风貌。

本文将从两个方面来探讨普希金的历史主义观。这两个方面是:普希金对卡拉姆辛及其《俄国国家史》的评价;普希金同恰达耶夫关于俄国有无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的论争。

—

皇村时期,普希金还没有表现出对历史的特殊兴趣。皇村学校毕业后,在彼得堡,普希金不惜花费时间、精力,钻研起卡拉姆辛的《俄

国家史》。此后,诗人对历史的兴趣日浓。

普希金关于卡拉姆辛和《俄国国家史》的种种看法主要反映在四篇文章里:《论国民教育》(1826)、《书信、思考和杂记片断》(1828)、《致莫斯科导报 出版者的信》(1828)和《H·波列沃依著 俄国民族史》(1830)。

当时的俄国,人们盲目崇拜西欧,对自己祖国的历史知之甚少,而且还浑然不觉这一缺陷。

《俄国国家史》的出版,用普希金的话说就是,具有“哥伦布发现美洲”般的重大历史意义。卡拉姆辛的这部多卷本历史著作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对俄国历史全貌作了概括介绍。从此,俄国历史知识通过卡拉姆辛的卓越才能灌注到了俄国社会,尽管暂时主要限于贵族阶层。以往的史书只是少数学者的专利。1818年头八卷一出版便“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响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卡拉姆辛发现古代俄国,看来,就象哥伦布发现美洲一样。一时间任何地方都不谈论其他的内容。”<sup>①</sup>普希金感叹“俄国人对俄国了解得太少”,他主张,要让历史知识“占据将以信念和真理服务于祖国的贵族青年的头脑”。<sup>②</sup>

《俄国国家史》是分别在不同年代陆续发表的。首批头八卷问世后,出现了许多批评意见。批评集中于一点,即书中有美化封建宗法制度、为专制政权辩护的内容。普希金也曾注意到这一点,在一首诗中他批评道:

他的历史以其优雅和朴素

不怀任何偏见,在向我们证明:

专制政体的必要

以及鞭子的迷人。<sup>③</sup>

维亚泽姆斯基责备普希金不该写此诗,毕竟当时普希金在诗歌创作上与卡拉姆辛同属一派,普希金却满意这四句卡拉姆辛式的轻松讽刺,他认为卡拉姆辛在书中为专制制度作了遮掩。

1821年,第9卷出版。卡拉姆辛在这一卷对沙皇专制的残暴进行了有力的揭露,譬如,第6章大胆而详尽地谈到伊凡雷帝的种种暴政。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连十二月党人K·雷列耶夫都赞扬道:他对伊凡雷帝专制的大胆描写震惊了同时代人。

普希金强调《俄国国家史》的价值首先在于其历史价值。普希金看到,卡拉姆辛以学者的严谨、文学家的丰满笔触对史料作了一番勘查。在《H·波列沃依著 俄国民族史》里普希金指出:“卡拉姆辛既是我们的第一位历史学家,又是最后一位编年史家。他那带有僧侣般敦厚的精神思索给他的阐述带来古老编年史的难以言传的美妙。”<sup>④</sup>这篇文章高度地评价了卡拉姆辛为俄国史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即,将批评精神注入历史著作,让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普希金倡导卡拉姆辛严谨治学的态度,在诗人看来,只有凭借这样的态度才能走上探求真理、传播知识的道路。

普希金对卡拉姆辛的默默耕耘表现出深深的尊敬。诗人在《论国民教育》(1826)一文中赞扬道:“《俄国国家史》不仅是部伟大作家的作品,而且还是一位诚实的人的功绩”;<sup>⑤</sup>继而,他在《书信、思考和杂记片断》(1828)里指出:“几乎没有人对这位在成就最为辉煌的时候静坐于书房,将整整十二载生命奉献给默默无闻、孜孜不倦劳动的人说声‘谢谢’。”<sup>⑥</sup>在普希金看来,伟大的作品一定是由伟大的人格孕育而出的。难怪他在自己的剧作《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卷首写道:“谨以虔诚和感激将本剧献给俄罗斯人所珍贵纪念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

辛”。

普希金不仅看到《俄国国家史》的历史史料价值,而且吸取了其文学价值,进而受“其天才鼓舞”创作了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实际上普希金是接着卡拉姆辛续写《俄国国家史》。在《鲍里斯·戈都诺夫 序》(1830)中,普希金总结道:“我遵循卡拉姆辛的思路明快地展开事件;我从编年史中竭力揣摩当时的思想方法和语言。”<sup>⑦</sup>值得注意的是,1825年创作《鲍里斯·戈都诺夫》时,普希金已经明显感到自己精神力量的成熟,所以该剧的意图决非机械地复制、传达卡拉姆辛的思想,而是表述了普希金于这一时期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民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剧中两股逆向运动的力量形成鲜明的对比:沙皇鲍里斯·戈都诺夫由兴到衰,而人民的力量由弱到强,人民最终以起义方式推翻沙皇统治。关于这一主题的思索一直延伸到普希金后期的作品《上尉的女儿》(1833-1836)里。

在形象塑造方面,普希金吸收了卡拉姆辛在《俄国国家史》刻画人物的原则。卡拉姆辛的人物性格往往具有两面性——通常又以极端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普希金那里,鲍里斯·戈都诺夫是集天使与恶魔于一身的沙皇,他时而贤明、豁达、善良,时而又狭隘、浅薄地抱怨自己的命运、抱怨人民。

在《鲍里斯·戈都诺夫》中,普希金力求将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结合起来。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比缅的形象塑造上。普希金在《致莫斯科导报 出版者的信》里说道:“比缅的性格并非我的发明。在他身上我集中了我们史书中能够吸引我的特点;在这遥远的过去时代的珍贵文献中表现出了非常令人感动的温和、婴儿般的同时又是充满智慧的朴实、对上帝赐予的沙皇政权的忠心耿耿和对浮华虚荣的完全戒绝……我觉得,这种性格对于俄国人的心来说,既新鲜又熟悉;为卡拉姆辛所深刻理解并反映在他那不朽著作中的古代史家令人感动的温厚,使我朴素的诗歌增色不少,而且一定会赢得读者宽厚的微笑。”<sup>⑧</sup>这里,普希金概括出卡拉姆辛风格孕育出的编年史家的典型特征:孩童般聪慧、

纯朴的心灵,可爱、温驯的秉性,虔诚勤劳,没有任何世俗偏见,带有君权神授观念。

在普希金笔下,比缅是个具有先知般的智慧、宁静致远境界的历史老人,他凝聚着典型的俄罗斯精神。可见,普希金深入到了俄罗斯精神的实质之中,进而又比卡拉姆辛更深地揭示了人民在历史中的作用与地位。从这层意义来讲,别林斯基认为,卡拉姆辛和他的《俄国国家史》最终吸引普希金的不仅是它的文体,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倾向与原则。

综括普希金对卡拉姆辛和《俄国国家史》的评价,我们再次强调,普希金的历史主义的最大特点是将视点置于现在,把历史视作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连续中把握历史、评判撰写历史的人。他的“历史感觉”是与真理感溶为一体的。“他和一切系统的、人工编成的教科书格格不入,甚至是对立的。”<sup>9</sup>而对历史严肃、认真的审视依赖于不计私利的好奇心、高度的诚实与孜孜不倦的勤奋。

## 二

普希金一直以祖国的历史为荣,尽管她的历史比起其他一些民族悠久的历史要短得多。他不允许任何人玷污历史、歪曲真实。因此,诗人既能够写出至今仍被视为呵护友谊、珍视友人的三篇诗歌佳作,<sup>10</sup>寄赠好友恰达耶夫(1794—1856),又能够抛出一封言辞激烈的信,抨击这位好友。普希金在这封信中旗帜鲜明地表示:“除了我们祖先赐予我们的历史,在这世界上无论如何我都不想更换祖国,或是拥有其他的历史。”<sup>11</sup>作为诗人,普希金又是怎样以诗的语言表述这一思想的呢(第10章,第15节):

他眼中只有俄罗斯,在世界上,  
他只珍爱自己的俄罗斯理想,

在此,普希金借“他”言己。实际上也是如此——他始终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客观中肯地看待自己祖国的历史与文化。

引起普希金写出《致恰达耶夫的信》的原因

是什么?

1826年,恰达耶夫从国外返回祖国后,便潜心于哲学研究。他发现,俄国历史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而他从西方接受的思想无法指点俄国未来的方向,于是恰达耶夫感到迷茫、失望,进而陷入忧郁的绝望,发出呐喊:1836年,第15期《望远镜》杂志发表了他的《哲学书简(之一)》。文章的中心思想如下:俄国一切的不幸首先在于东正教的兴盛,东正教没有给俄国带来积极的影响——俄国没有过去。世界上所有民族中唯有俄罗斯民族对世界毫无贡献。俄罗斯人不仅没有从其他民族那里学到什么,而且一直在玷污人类的精神。俄国现在与西欧隔绝了,这样势必陷入无知和野蛮——俄国也将没有未来。俄国人没有祖国,是“无家可归”的飘零者。恰达耶夫的文章笔锋严酷、犀利,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对俄国的历史和传统持有否定批判的态度,另一方面酣畅淋漓地表达了欧化的贵族先进知识分子的内心痛苦和精神悲剧,这些都被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描述了出来(第2章,第6节)。

恰达耶夫以哲学的思辨语言,普希金以诗歌的形象化语言,不约而同地概括了当时贵族青年中间普遍存在的典型情绪。奥涅金的形象被俄国文学称之为“多余人”。“多余人现象”是普希金时代一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文化现象。

奥涅金是觉醒了的俄国贵族青年的典型,这些青年大都天资聪颖、知识广博,从小受到欧化的教育。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盛行于俄国之时,他们正处于世界观的形成期。在他们的个人经历里,最初耳闻目睹的是1812年卫国战争中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公民意识迅速觉醒的蓬勃景象,而后,则是江河日下的现实——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尼古拉一世王朝的伪善、残暴与堕落。越来越严的思想禁锢令许多人害上了“俄罗斯忧郁症”,他们之中只有小部分人转而回归到俄罗斯的民间传统中去,加入到力求改变现实的人们的行列里;大部分人还是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和自己的社会责任,悲观地叹息、抱怨现实,认为自己是在故乡与异乡之间飘

泊无定的精神流浪者，“无目的、不劳动地活到今天”。眼看韶光逝去、理想成灰，他们仍然不满意别人，也不满意自己，不甘心庸碌无闻地活着。富有诗意的天性依然企盼着生命新陈代谢的动力。然而，现实中的人不可能完全超然于社会、时代之外，所以，“奥涅金们”总众边缘徘徊。越界与不越界的痛苦时刻折磨着这些处于社会转型期、貌似多余的“文化边缘人”。

普希金时代，贵族中的先进分子都希望一方面建立自己健康的人格，另一方面建立周围的“文明生活”。文明的人类本来就对双重意义上的美好生活怀有本能的渴求。普希金提醒人们，人的生活、生命好似不断负重奔跑的马车，对自由的追求、对理想生活的憧憬，不能抛弃文明社会的一切。这一思想在诗人20年代初的诗作中已经反映出来，象《敦格涅吉奇》（1821）、《生命的马车》（1823）和长诗《高加索的俘虏》（1820—1821）。

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看，“多余人”并不多余。任何民族、任何时代都需要一批饱含忧患意识、充满批判精神的才人智士，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才富于活力与创新。由他们构成的群体看似不安分，甚至令当政者头疼，但正是他们“逼迫”着民族不满于苟安平庸，而去追求人类通向理想的境界；正是他们让社会与时代不得不去发掘新需要，重新衡量并调整古老的法则、旧有的标准，进而策划推出新的文化目标、价值体系。

普希金写于逝世前三个月的《敦恰达耶夫的信》文采飞扬，观点明朗，思想深刻，激情满怀。它是普希金留给后代的遗言，是普希金在行将告别人世之际的思想宣泄。它是诗人以高度凝练的语言在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观作一番总的巡礼。该信的主要观点为：俄国有自己完整而丰富的历史；俄国文化拥有独特的渊源，俄国文化决不是在异质文化模式上发展起来的；俄国曾以自己惨重的牺牲换来了人类精神的巨大进步，俄国人应当引此为荣。下面我们来谈谈这封信的具体内容。

普希金是他那个时代仅次于卡拉姆辛，对俄国历史作过全面、深入研究的人。因此，他为

俄国历史的辩护具有权威性。普希金向恰达耶夫——历数俄国历史上的辉煌事件与划时代的人物，如俄国的内讧、发展和统一，如伊凡雷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彼得大帝，<sup>12</sup>在此，普希金点出了俄国历史发展中的几位关键性人物。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在其他地方，普希金评说过伊凡雷帝的血腥暴政，而这里却是从正面意义上肯定他为俄罗斯统一作出的重大贡献。本文开始，我们谈到，普希金认为，俄国历史向来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相同，评价俄国历史需要一种特殊的尺度。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文化是历史的投影。正是鉴于对俄国历史的深刻认识，普希金强调，俄国文化发展到今天，走的完全是自己的道路，他纠正恰达耶夫，说道：“您认为，我们从中汲取基督教知识的源泉并不纯净，拜占庭本应受到轻视等等……我的朋友……我们从希腊人那里拿来福音书和传说，却不是幼稚的琐细和口角的习气。拜占庭的风俗从未成为基辅的风俗。”<sup>13</sup>普希金关于基辅罗斯文明是独树一帜的文明，这一论断非常正确。基辅罗斯时期，尤其自公元988年“罗斯受洗”以来，罗斯与拜占庭的贸易和战争趋于频繁，拜占庭神父和希腊书籍源源不断地涌入罗斯，拜占庭的神学、宗教、艺术等方面的精神财富对于形成俄罗斯文化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俄罗斯人民才是自身文化的创造者，他们亲手建造了俄罗斯文明生长的摇篮——基辅和诺夫哥罗德，谱写出代代相传的壮士歌。虽然《敦恰达耶夫的信》没有直接列举诸如此类的文化事实，但是，普希金以高度凝练的语言，传达出他对丰富独特的俄罗斯精神文化遗产无比珍视的感情。

普希金不是在这封信里才倡导人们重视祖国精神文化的价值。早在20年代创作《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普希金就通过达吉雅娜的形象，提醒一心向往走西欧道路的俄国人，不要忘记和轻视俄罗斯民族的优秀传统（第5章，第4节）。“灵魂上的俄罗斯人”达吉雅娜是普希金为俄国生活树立的理想，她与俄罗斯大地，与俄罗斯底层的、民间的东西密不可分（第8章，第46

节)。诗人借达吉雅娜想要换回宁静的俄罗斯乡村，暗示那些迷失方向的俄罗斯人：我们真正的精神家园在哪里，俄罗斯的民族特色蕴藏在何处。所以，达吉雅娜不单纯是向往爱情、渴望家庭幸福的女性的化身，她是普希金美学思想的高度概括与明确表述——诗人将达吉雅娜视作整个俄罗斯民族的精神需求，它比追求个人幸福的意义要深远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达吉雅娜是俄罗斯民族精神气质与内心力量的象征。

人类发展到今天所拥有的巨大的精神文化财富，是世界上各民族轮番作出贡献的结果。普希金以他那超出同时代人的全人类眼光，引导恰达耶夫走出片面、偏激：“无疑，分裂出去的教派把我们与欧洲整体割裂开来，因而我们未能介入任何一桩震惊欧洲的重大事件，但是我们有自己的特殊使命。正是俄罗斯，正是她那辽阔无边的疆土吞没了蒙古人的入侵。鞑靼人未敢越过我们的西方边界，将我们置于后方。他们回到自己的草原上去了，基督教文明得以拯救。仅仅为了这一功绩，我们就完全可以傲立于世……我们的磨难让天主教的欧洲不受任何干扰地蓬勃发展。”<sup>14</sup>无可置疑，普希金这一论断是天才的真知灼见。后人们用近似的语言重复着他的深刻见解。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罗斯人是拯救者——拯救人们免受蒙古压制的拯救者，他们竭尽全力阻挡蒙古人，不许蒙古人进入欧洲，他们确实是保护欧洲的一座墙，承受了所有射击的一座墙，被敌人摧毁了一半的一座墙”；<sup>15</sup>比起车尔尼雪夫斯基，苏联著名历史学家B·马夫罗金表述得更加学术化、理性化：“只因为罗斯把剩余的全部欧洲从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马克思语）中拯救出来，但丁和莱奥纳多·达·芬奇，马可·波罗和瓦斯科·达·伽马，哥白尼和哥伦布，麦哲伦和乔叟，胡滕贝格和胡斯才有可能创作自己的出色作品，创造伟大的事业和作出惊人的丰功伟绩。如果不考虑到罗斯人在拔都入侵时期所作的贡献，那就无法理解文艺复兴时代和原始积累时代的伟大发现和发明。”<sup>16</sup>

在论述了俄罗斯文化是循着自己的道路发

展起来之后，针对恰达耶夫只看到俄国僧侣阶层“今不如昔”，未看到它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普希金提醒恰达耶夫注意：“费奥凡之前，我们的僧侣阶层是值得尊敬的。它从不用教皇主义的卑鄙行为玷污自己的名声，当然，它从未在那个人们最需要统一的时候发动变革。”<sup>17</sup>最后这半句话揭示了俄国僧侣在积极推动罗斯统一事业中的功劳。罗斯统一的观念在宗教界出现得较早。14世纪初，东正教教会开始关注全罗斯的事业，支持大公将罗斯合并为统一的国家。早在1822年，普希金在《关于十八世纪俄国史的笔记》中阐述过自己对僧侣阶层的看法：它曾一直是处于民众和国君之间的中介人，如同介于人类和上帝之间。我们的历史，进而我们的教育归功于僧侣们。可见，普希金的文化观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肯定进步的僧侣阶层在俄国历史、文化发展关键时刻发挥的作用：二百多年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使罗斯的物质、精神文化的发展遭到严重摧残。众多的城市乡村被夷为平地，大量的文化历史古迹被毁坏，建筑、雕塑、绘画、文学倒退得十分厉害，可是，这一时期罗斯文化并未中断，仍以基辅罗斯文化作为蓝本发展，原因就在于具有启蒙意识的僧侣阶层。

普希金的思想、创作乃至为人人都带有积极、乐观的成份。他总是善于发现被审视对象身上的向上因素，对世事、人物的评价向来一分为二，满怀同情、宽容的精神。普希金的同情，不是怕得罪什么的怯弱，正如他的批评从不有意与谁为仇一样。同情与批评都是发自内心的对人的爱，对真理的尊敬。因为他一贯主张：批评的态度要端正，“讽刺不是批评——嘲弄不是反驳”（普希金全集第7卷，第101页）；批评“要求的不仅是健康的思想，还有爱和科学”（普希金全集第10卷，第398页）。在《致恰达耶夫的信》的结尾处，普希金指出：“……必须承认，我们的社会生活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这就是缺乏社会舆论，这就是对一切职责、正义和真理持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就是对人的思想和尊严表现出无耻的蔑视——这些的确会令人陷入绝望。您大声地说出了这一点，您做得对。”<sup>18</sup>普希

金的这段话表明,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的结论尽管站不住脚,但是它对俄国现状及前途的忧愤饱含了作者的真情,文章本身已退居次要地位,它对思想界的震动以及即将带给人们的精神的长久而深刻的影响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点从30年代至40年代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论争中反映出来。在尼古拉一世严格禁锢人们思想的年代,恰达耶夫难能可贵地说出自己和民族想要说的话。普希金最为敬重这样的爱国主义者。

19世纪初,俄国贵族社会充斥着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人们盲目崇欧,“言必称法国”,缺乏祖国意识,为祖国辩护反被视作落伍。普希金的小说《罗斯拉甫列夫》(1831)揭示了这一现象:“模仿路易十五时代的法国腔调成了时髦风气。爱祖国被看作迂腐。当时的才子们卑躬屈节地疯狂称颂拿破仑,并且取笑我们的失利。可惜,为祖国辩护的人都太老实了;他们被人百般嘲弄讥笑……青年人都用一种轻蔑或冷淡的语言谈论俄国的事情……总之,这个社会是够恶劣的了。”<sup>19</sup>人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生活方式都受到极度扭曲。抛开观点正确与否、真理站在哪一方这一问题,普希金和恰达耶夫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者。他们不粉饰现实,不沉湎于空想、悠闲、懒惰、而是不断思考、探求着俄国通向未来的道路。

在这封信的最后,普希金充满善意地说:“但我担心,您的宗教历史观点不要对您有什么坏的影响。”<sup>20</sup>因为,普希金看到,恰达耶夫潜心于哲学,他的哲学观中有天主教的天命论以及社会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就象这样,普希金对朋友、对同时代作家的思想与创作一向关怀备至。

如果从纵向上把《致恰达耶夫的信》与三年前写成的长诗《青铜骑士》、八年前诞生的另一部长诗《波尔塔瓦》以及九年前出现的第一部散

文学作品《彼得大帝的黑人》串联起来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普希金确立俄国文化的思想倾向。如果我们再从横向上来看普希金在生命最后一年的主要创作活动,也会发现,诗人预感到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于是再次凝望俄国历史,同时对自己一生寻求生命存在更高的意义和价值进行归纳与总结:1836年初,他写了《论伊戈尔的远征》;5月,到达莫斯科,便一头扎进档案馆,查找有关彼得大帝的史料,加紧撰写动笔于1827年的《彼得大帝史》资料;8月31日,写下那首著名的诗《纪念碑》;10月19日,致信恰达耶夫。

通过《致恰达耶夫的信》,普希金醒示所有俄罗斯人,俄罗斯大地是俄罗斯人永恒的精神港湾。只有了解并热爱自己祖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民族才不会失落精神的家园,国家才能永远保持前进的精神动力。

从普希金对俄国历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来看,他是继卡拉姆辛之后的又一位文学家—历史学家。他的“历史理解”比起同时代人更接近历史的真理,这一点已为后代人所公认。他具有历史学家客观评判事物的清醒头脑和犀利目光。

#### 注释:

①②④⑤⑥⑦⑧ 普希金全集,苏联科学院1951年版,第七卷,61,48,136-138,48,62,164-165,74页。

③ 普希金:《给俄国史的作者》(1818),查良铮译。

⑨ 普希金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3页。

10 指1818、1821、1824年先后写成的《致恰达耶夫》。

11 12 13 14 17 18 19 普希金全集,苏联科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十卷,868,867,867,866,867,868,818页。

15 16 《霍尔尼雪夫斯基文学遗产》,转引自B·马夫罗金:《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商务印务馆1991年版,13页。

20 普希金:《罗斯拉甫列夫》,冯春译。